

论《尚书》周公的忧患意识

On the Duke of Zhou's Consciousness of Crisis in the *Book of Documents*

余素云¹

Pitchaya VIPAVEENUKUL

พิชญา วิภาณุกุล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东语系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Art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ailand

pitchaya.v@chula.ac.th

摘要 周公历经殷商衰落、周朝兴盛的时代交替，明白家族的命运不仅在天时，也在人为，因此，如何保住周氏统治政权，是他最重视且最担心的事情，其忧患意识体现出他对周王朝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周武王后，周公对周王朝的安危更是感到忧虑，他汲取历史教训并结合当时的礼乐文化制度，寻找稳固周家统治地位的方法，推行宗法制，管理社会秩序。他提倡统治者以德行、任贤、安民为重；士人必当忠君爱国，以正直、忠诚、无私的态度辅佐统治者。周公的忧患意识不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同时也影响了世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后代的君王皇帝和士大夫无不受到周公忧患意识的影响。

关键词 周公；忧患意识；天命观；《尚书》

Abstract The Duke of Zhou, had experienced the fall of Shang dynasty (c. 1600 BC–c. 1045 BC) and the rise of Zhou dynasty (1046 BC–256 BC). He realised that the fate of Zhou clan was not designated only by God but also human themselves. Therefore, how to protect Zhou clan regime was the serious matter he concerned the most. The Duke of Zhou showed sense of duty and purpose through his consciousness of crisis. After King Wu of Zhou (d. 1043 BC) died, the Duke of Zhou sensed Zhou clan danger. Learning from history, he created ritual and musical system, finding the best way to entrench Zhou dynasty. Zhou dynasty enforced patriarchal system, reorganized social mechanisms. He counselled the kings of Zhou to attribute to virtue, appoint people by abilities, maintain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territory, consequently, the officials must keep loyal to their kings, helping Zhou dynasty with integrity, fidelity and impartiality selflessness. The Duke of Zhou's consciousness of crisi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providing found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hich also affects the values of intellectuals since then.

Keywords Duke of Zhou; Consciousness of Crisis; View of Destiny; *the Book of Documents*

一、引言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历史事件、政治事件的记录和保存。夏商时期，人们就已经有意识地保存着记录历史事件的文献。到了周朝，周人认为先人的经验能起到引导和借鉴的作用，对文献记录极为重视，开始设立专门记录、汇编文献的部门和官职。《尚书》便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它汇集了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文献，分为虞舜时期的《虞书》、夏朝的《夏书》、商朝的《商书》和周朝的《周书》。《尚书》中《周书》中的文章由周朝史官记录、保存、收藏、编辑、整理而成，

收稿日期：2022-11-29

作者简介：¹ 余素云（พิชญา วิภาณุกุล, Pitchaya VIPAVEENUKUL），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东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先秦汉魏六朝文学。

其内容多为官方文告，均出自这些周朝史官之手，大都是史官记录臣子们对君王的政治言论，后被孔子选入书中。《尚书》成书后，经历了秦朝“焚书坑儒”事件，只剩下一些残缺的部分。后来汉朝提倡恢复古籍，尤其是儒家经典古籍，《诗经》《尚书》等于是汉代出现了很多古文和今文版本，现在所看到的版本是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和伏生的今文《尚书》，东晋梅赜把古今版本合编《尚书》五十八篇。

《尚书·周书》中最重要的人物即是周公。周公，姓姬，名旦，是西周初年周文王与太姒的第四子，周武王的亲弟弟，周成王的叔父。周公是一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先驱，是孔子尊为先圣的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P.1825]周公辅佐周武王灭了商朝，被封鲁公并统治鲁国，他本可以在封国享福，但他却留在京城辅佐周武王。周公是一位多才多艺且有仁德的人。周公自己也很清楚自己聪明仁孝，也非常忠诚于周武王和周人的天下。《史记》载“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P.1826]

从史书对周公的记载可知，周武王灭商后第二年¹，周公愿替武王担任拜祭祖先的角色，并向太王、王季、文王等先王言己能“事鬼神”。“事鬼神”是以祭祀祖先和自然神为主的原始宗教，该信仰是周朝礼乐文化发展、形成的开始，随之周朝确立了祭祖、册命、征伐、招聘、农耕、乡饮、婚丧的礼仪性规范（过常宝，2015）。西周初期，周武王突然崩逝，留下年幼的周成王。当时西周局势尚未稳定，为了平定内忧外患，周公作为摄政王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处理政事七年。在这七年间，周公担心周朝会重蹈覆辙，走上夏商的灭亡之路，其忧患意识也由此形成。

二、周公的忧患意识及产生的背景

人类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驱动者，而促动人类文化不断创新发展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人们内心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指的是从现实情况出发，通过熟稔历史对未知事物将会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示的忧虑和警惕，危机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使人们时时自警反思，并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避免或减少灾难的发生。“忧患”一词在中文文献中最早见于《易传·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P.312]忧患意识的具体表现最早体现在《尚书》中，在西周初期诸诰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尚书》中的周公旦形象亦是中国古代历史中最早具有忧患意识的代表人物之一。西周灭殷两年后，武王驾崩，国祚甫立的周王朝面临危机。周公旦有感于前朝兴衰，深入探究其因，试图为周王朝找出治国之法，维持王朝长久之命。他的忧患集中在对于国祚国运，希望继任的君王能安民任贤，保住上天所赐的天命，以免国家陷入灭亡。《尚书·大诰》云：“肆予冲人，永思艰。曰：呜呼！允蠹鳏寡，哀哉！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

¹ 目前说法不一，司马迁的《史记》则说是第二年，而出土文献清华简《金縢篇》文中则说“武王既克殷三年”。

义尔邦君，越尔多士，尹氏、御事、绥予曰：“无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P.512]其中所体现的忧患意识涉及到国家安危、忧国忧民等爱国精神，启发后来的历史人物如司马迁、诸葛亮、王安石等人家国兴亡的自觉意识。然而如果从阶级利益的角度看，西周统治阶级在君王显赫的威严下崇德保民、安民，实则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考虑。

周公的忧患意识来源于对历史的熟稔，因此身为周氏贵族、周武王弟弟的周公认为他的使命即是保护周王朝，并保证统治权力能够延续。所谓周公忧患意识的背景，是指当时激发周公表现出忧患意识的外在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当时的外患。周朝刚从从小邦化身为有夏的统治者那里明白一个道理——“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P.508]人们见证了文王与武王“小邦周克大邑殷”的成绩，但仍免不了现实的政治难题，那就是如何统治殷遗民，如何引导他们化身为周朝的“新民”。更让周朝忧心的是尚存的殷朝王公贵族不知何时会趁机反抗。周公这份忧虑确实是情理之中，而“三监之乱”便证明他如此忧心是必要的。由此在康叔将要去殷旧地时，周公与康叔交代，如《尚书·康诰》所言：“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听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P.548]周公认为殷商初平，恐遗民前来拜访；为了不让殷商遗民有陪伴之心，将《康诰》传达他爱子如民、一视同仁的胸怀，支持康叔赏罚分明，宽恕殷民，不侮矜寡。

其次为周武王的驾崩。周公认为上天舍弃暴德的纣王，施命于周王朝都是因为文王、武王两位圣君。若欲继续受到上天命运眷顾，维持周朝的兴盛，那么周王朝的君主必须像文王、武王那样尚天崇德。可周武王于克殷两年后驾崩，此事致使苦战赢得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本来周朝应该由武王一步一步地巩固下去，却被“天降割于我家”^[P.506]，周武王驾崩的危机激发了周公保护周王朝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也成为周公决定不回封地，辅助成王并代为摄政的原因。

最后是前朝反面的教训。夏桀与商纣的结局成为周公慎重考虑周王德行去向的重要参照。“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P.636]周公因对历史的熟稔而对周朝统治产生了“忧患意识”，他的天命观与治周之法都借鉴了前世两朝的经验，他担心周王会重演像夏桀商纣那样的残局。夏桀在位时内政不修、外患不断，导致民不聊生，危机四伏；而身为君主的他却骄奢淫逸，不愿听忠臣劝谏，认为夏朝不会灭亡，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周公发现昏君的暴行会给王朝（宗家）带来灭亡的命运，上天会抛弃不能安民明德的王朝（宗家）。由于对后来周王的德行十分忧虑，他在《周礼》中用天命观来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委，以天命观表达他对周王朝的忧患意识。

三、周公忧患意识的具体表现

《尚书·召诰》：“唯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P.579]周公忧患意识是对整个国家的关怀和忧虑，因此他以严格的德行标准要求各阶层的人，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君王、大臣、贵族，充分体现出他治民的努力和关注。周公所忧患的对象可分为四个阶层：贤臣、民众、君王及王朝，而这四个阶层都互相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各阶层的“德”都是为了安民而生，同时人民也以与天感应的理由间接地规劝上层人物的行为。

（一）忧任贤

正所谓“爽邦由哲”，周公认为国兴是需要君王与良臣共治，该道理在历史上已经被无数次证实。“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P.646-647]他尤需经验丰富的老臣为王分忧，给君王提供建设性的国策，在关键时也能劝谏君王。周公认为这些老臣会陪伴着刚上位的成王走向圣君之道。可是让周公忧心的是，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老臣在身边。“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P.506]“汝丕远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训”^[P.534]，他慨叹当今王朝求贤若渴。周公对任贤没有很多要求，不管是周贵族还是周民、殷旧臣还是遗民，他只看那些人是否有德，“予一人惟听用德。”^[P.624]因此对于求贤特别重视。《史记·鲁周公世家》中曾记载周公求贤若渴的表现，他“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P.1928]，担心自己错过任何一位能为周王朝作出贡献的人。

(二) 忧民不康

《尚书》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P.535]周公认为人民生活的好坏为天命所向，因此如何保住周王朝的命祚，须着眼于周民的生活情况。周朝的天命观既继承了商朝的思想，又有一些新变：商朝无条件认为一切现象皆为天命，人无法改变它；周朝的天命观认为天命是顺从人心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求得天命。周公认为周朝可以永久昌盛，但事在人为，只要没有出现像夏桀王、商纣王那样昏庸君王，那么周朝也许不会面临亡国危机。因此如果君王能让国民安居乐业，那么周王朝就能继续承续上天之命。而如何让周民与殷遗民安居，关键就在于君主是否尚德。周公所指的德是广义之德，既有休德，也有暴德，最重要的是希望成王能够拥有恤民的美德，这是他提出尚德保民中“德”之义，《尚书》多见其保民之法：

明德慎罚。“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P.538]该思想自文王、武王已有之，“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P.532]对于罪犯与嫌疑人，统治者须谨慎地考察那些人的罪行。周公认为即使是统治者，也不能错杀无辜，施刑的权利惟统治者所有，若有差错也都要全权负责，“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无或劓刑人”^[P.537]。此话表现出周公关心人民的生命安危，同时也从宽裕之心去同情和理解人民。刑罚办得妥当，断案谨慎，便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服从。对于犯罪的人，周公也制订一条具有进步思想的定罪准则：“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为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P.536]定罪准则的核心并不在于罪行的严重性，更重要的在于犯罪者是否有犯罪动机。如果他们的罪行出于无意的行为，周公认为可以不治罪，可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在《尚书·梓材》中，周公也督促康叔要善待殷遗民，不滥杀无辜，宽恕罪人，谨慎用刑，如“肆往，奸宄、杀人、厉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P.563]，宽恕有犯罪前科的人。

用殷法文化治殷遗民。殷商曾是统治中原的泱泱大国，拥有自己的文化和法律。周公认为周王朝不应一时之间就用周国的法律以及文化全盘代替殷人原有的。突然改变原有的文化，殷遗民可能不能适应。在《尚书·康诰》中，周公怕康叔做事不谨慎，特别叮嘱：“往敷求予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P.534]建议康叔了解殷遗老

的思想动态，才能知道如何治理与驯服他们。至于断案，周公让康叔依殷法施刑“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不得随康叔的心意制裁。此外，对文化习俗的态度，周公很宽容地对待殷人。他命令周众民除祭祀仪式之外，任何场合均不得饮酒，即使在祭祀上亦不能一醉至忘形；而由于殷人嗜酒成性，周公允许他们饮酒的场合要比周民更多。此举体现出周公一国多制的超前政治思想。

视民如子、不侮鳏寡。周公担心统治阶级治理国家时忽略了人民的感受，导致无意伤害百姓，因此劝告统治阶级将心比心，视民如赤子。“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P.537]把人民视为己子，将其罪行看成等待治疗的病疾，这种思想对后来仁政治民的思想颇有影响。《尚书》也谈到了鳏寡的悲惨命运，他们是社会中无依无靠、家庭残缺的特殊群体，在精神和生活上无伴相依，因此周公认为若要安治他们，便要下更多的努力和关心——“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P.632]；“怀保小民，惠鲜鳏寡”^[P.634]。

（三）忧君不敬德

周公知道，周朝若要昌盛延寿，统治者决不能像商纣王那样荒废政事，置人民于不顾，而必须像先前道德高尚、颇得人心的君王学习。他之所以重视周朝君王的德行，也是因为关心周朝兴衰，在有生之年时努力以史为鉴。周公担心周王朝无贤臣，担心人民不得安宁，成功与否，其关键在于君主的德行。君主若无休德，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的安危，上天也会将天命交给他邦。因此周武王逝世后，周公在他诸诰中多次劝告统治阶级如何安民，如何为王。

其一，“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P.636]夏桀商纣的结局皆来源于酒色。为此周公命令除了祭祀之外，不得在其他场合饮酒，并作《尚书·酒诰》：“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P.554]；“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祇，保越怨不易……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P.557]。

其二，担心成王安于逸豫。身为叔父，亦曾任武王大宰的周公把保护周王朝归为自己的使命，同时也监督成王的德行，劝谏成王不得贪图玩乐，安于现状，而应效仿先王，了解民间疾苦，并以历史上昏庸君王为劝诫之例。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曰：“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P.1831]《尚书·无逸》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P.636]这是周公劝诫成王的一篇文章，充分体现出他对周朝未来的担心和对周成王的不放心。周公以民为国之本，认为若成王不能像文王武王那样知民之苦，那他就是“厥父母勤劳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艰难”^[P.629]；“不闻小人之劳劳，惟耽乐之从”^[P.633-634]。周公很清楚逸豫不敬德的君主带给王朝的灾难后果，《尚书·无逸》云：“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P.634]。君王须体恤民情，莫敢或遑。周公希望继后的周王给王朝带来福祉和安定，因此时时叮嘱成王念兹在兹。除了《尚书·无逸》以外，《尚书·多士》中也有提及君王该怎么表现，以诫成王。

（四）忧家亡

周公忧家的安危源于对天命观的畏惧和对周王德行的不放心，其在《尚书·牧誓》列出商纣王

六条罪状：酗酒，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上天才收回赐予商朝的天命^[P.412]。周公为了不让商朝的命运重演在周朝身上，认为统治阶级须敬德保民，视安民为最终目标，而行使天命者为统治阶级的最高君王。君王的德行对民臣以及整个国家都有影响：“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P.586]。

君王的角色如此重要，对整个国家都有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因此武王驾崩后，当时身为大宰的周公预测武王薨逝可能引发国家外患，尤其刚失去统治地位的殷王子武庚可能会叛乱，亦担心上天会因尚为“孺子”的成王有差池过失而舍弃周王朝天命，因此德智兼优的周公遂开始长达七年的摄政。周公认为这次摄政非常必要，“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P.499]；“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P.512]；“予曷敢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P.514]。可见周公认为国家存亡在于国君德行，而他认为当时的成王尚未符合条件，而他便是唯一能保有周王朝的执令人。

四、忧患意识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地位

李泽厚先生（2015: 2）曾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指出：“它（周礼）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作为早期宗法制的殷周体制，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缘的层层衣装之中，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直接从原始文化延续而来。”周公的忧患意识使他制礼作乐，用文字将延续周朝礼仪音乐记录下来，通过礼乐制度规范社会秩序，奠定周朝社会伦理乃至政治体系的基础，确定社会阶层的责任和地位。

然而，随着西周的衰落，周公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塌，周朝君王的权威被各国诸侯挑衅。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时代，是战争不断、兵火连天的时代，也是周礼被各种思想和现实推翻的时代，唯有儒家圣贤孔子、孟子支持周礼。如果没有孔子坚持保持原始的社会系统和体制，氏族贵族们也保不住传统的世袭地位，抛弃祖先尊崇的礼仪制度，人们唯利是图，弃道而逐利，那么，周公为中国社会奠定的基础和传统也难以传承至今。李泽厚（2015: 9）认为当时儒家思想的发展是逆流而上的，因为当时的社会礼仪制度正在社会矛盾和思想的碰撞中流动，孔子保留并突出了中华民族原始的士族统治体制，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民主性和人民性，推广到各个阶层。无论是否受过教育，是否是贵族身份，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责任。春秋战国时期的忧患也从统治阶层扩展到知识分子阶层。这些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忧患理论化，变成忧国忧民的群体意识、社会意识、牺牲精神，从当初周公因对王朝未来感到不安而制礼作乐的最初目标，变成统治者用来整治社会秩序的礼法工具。这种忧患意识也成为所谓“士人”“君子”应备的道德品质，如《论语·卫灵公》“君子忧道不忧贫”^[P.216]；《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P.1592]；《礼记·杂记》“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P.1221]等等，皆作如是观。

忧患意识成为社会的崇高道德，它代表臣子士人的忠君爱国，代表普通民众以为国为民贡献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取向。秦汉以后，普天之下，所有臣子和士人都要忠诚于当代皇帝才能实现人生价值；但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入仕为官，社会上总有大量不被重用的不遇士人。社会规范化的忧患意识遂慢慢渗入文学创作领域中，历史上具有忧患意识的政治家与文学家，才华横溢，勇于劝谏，

却屡遭弃用、壮志难酬，抑郁而终，屈原、贾谊、阮籍、杜甫、辛弃疾、文天祥等，无一例外。屈原为战国时期楚国贵族，才华横溢，敢于劝谏，曾受到楚怀王的信任。由于刚正不阿而被群臣陷害，遭两次流放，但这两次失败都不能磨灭他忠贞爱国的心。阮籍为曹魏中后期竹林七贤之一，虽支持曹氏，但也无法反抗司马氏的权力，只能违心地给司马昭办事。为了活命而违背了自己的内心，他日日饮酒以逃避现实，也经常借酒推脱司马氏求办之事，在司马氏准备篡位时，令阮籍写《劝进表》。阮籍见证司马氏清除异己、曹魏灭亡，写就《劝进表》之后他便幽愤离世（徐公持，1988: 81）。现代作家鲁迅，对家国的忧患意识与古人并无差别，他通过写作和翻译国外文学试图唤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呼吁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作出改变，不能让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止步不前、走向衰落。在鲁迅名作如《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伤势》等小说当中，都可以感受到他深重的忧患意识，敢于揭露当时人身上的愚昧、麻木、堕落、自欺欺人，揭开中国当时的毒瘤，同时也向新一代青年寄予希望。虽然鲁迅的主张是反传统，批判封建社会，但不得不承认鲁迅与周公以及其他古代圣贤一样，身上流淌着为国为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尚书》中，我们能清楚地了解周公的忧患意识及其影响。周人认为上天会监察国家的统治，而统治者须谦敬、节俭、爱民、仁德，上天才会继续给予他们天命，让周王朝延续下去。周武王的崩逝使周朝陷入外忧内患的危机中，周公欲图江山永固，由此产生忧患意识。周公的忧患意识虽然以统治阶层的利益为出发点，但他提出的尚德保民、立政任贤、明德慎罚，也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进步一面。周公的忧患意识不仅确立了国家统一的政治形态，也确立了周王朝历代沿用的礼仪制度。后人谓之“制礼作乐”，即是指他对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宗教礼仪、伦理制度作出改革之功。这些宗教信仰和礼乐仪式为周公的理性教化提供了合法性和神圣保障（过常宝，2015）。在周王室没落、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之时，孔子和孟子的儒家思想延续了周公的精神，他的忧患意识也因此得以传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成为历代士人推崇的精神。

参考文献：

- (汉) 司马迁.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汉) 孔安国传, (唐) 孔颖达正义. 尚书正义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汉) 王弼注, (唐) 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 (十三经注疏本)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魏) 何晏注, (宋) 邢昺疏. 论语注疏 (十三经注疏本)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汉) 郑玄注, (唐) 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 (十三经注疏本)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 吕庙军. 周公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徐公持. 阮籍与嵇康[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郝明朝. 《尚书》所见之周公思想 [J]. 管子学刊, 1998(2): 41-45.
- 由婧涵. 《尚书·周书》中的天命观与忧患意识[J]. 山西档案, 2016(6): 171-173.
- 王灿.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2(5): 24-26.
- 赵法生. 天命观视域下的西周忧患意识——西周忧患意识的重新解读[J]. 哲学动态, 2018(10): 38-43.
- 过常宝. 西周制礼作乐与经典的生成 [J/OL]. <http://www.nopss.gov.cn/n/2015/0304/c230113-26634284.html>.

(责任编辑: 唐晓莉)